梁斌研究会10年间

□宋安娜

梁斌先生的《红旗谱》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前进的脚步与成就。它是一部中国农民觉醒与奋斗的宽广壮丽的史诗；它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标志着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回归本土、回归民族文化的重大成就；它慷慨悲歌、燕赵风骨式的悲壮美别开生面，创造了审美新境界，独步文坛，鲜有来者；它所塑造的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文学典型，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而且振聋发聩，至今巍然屹立，无可比肩。今天，中国文学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文学审美与文学批评都进入了一个更广阔、更多元的新境界，梁斌作品的历史、现实意义仍然无法替代，它独特的审美意义尚待深入开掘，它丰富的文化蕴涵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今年是梁斌诞辰100周年，天津梁斌研究会正在积极筹备纪念活动，召开研讨会，举办展览，编辑纪念文集，以此为契机，开拓梁斌研究的新局面。

天津梁斌研究会的前身为天津梁斌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94年。那年4月，在天津举办了梁斌文学活动60年庆祝会和梁斌创作研讨会，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李希凡等出席，著名作家欧阳山发来贺信。会议充分论述并肯定了《红旗谱》的里程碑地位，高度评价了梁斌文学的时代意义，深入探讨了梁斌的创作风格。会上，许多文学界人士都感觉组织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很有必要，天津梁斌文学研究会就应运而生了。没有编制，没有资金，文人相聚，全凭一份对梁斌的崇敬和对文学执著。研究会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就团结了一批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初步形成了研究队伍。此后，研究会召开了多次研讨会，深入研究梁斌的文学作品，并遵照梁斌关心青年、扶植群众文学活动的嘱咐，面向青少年举办“梁斌杯”征文，面向全国举办主题征文，传播红色经典。

从天津梁斌文学研究会成立，我便有幸参与其间，并亲历研究会近10年来的进程，亲历着它在拓展文本研究、作家本体研究、艺术研究和扩大社会传播等方面的每一次掘进。

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对梁斌作品的评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比较充分了，其实不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梁斌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社会学层面，对作品的社会意义关注较多，对美学意义关注不够；对作品的政治含量关注较多，对文化含量关注不够；对某种创作方法关注较多，对文本所提供的其他艺术信息关注不够，而这些信息丰富的程度令人吃惊。2004年，时值梁斌诞辰90周年，研究会决定以此为契机，召开“梁斌的文学道路与成就研讨会”。这个想法得到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天津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5月间，由这3家主办、由天津市文联、天津市作协、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作协和研究会联合承办的研讨会如期举行。主办方和承办方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我受研究会委托，筹备会议的内容并将论文编辑出版。为了在短短一天的会期中能够将研讨引向深入，提前大半年我就向有关高校和文学评论家约稿，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积极响应，论文陆续来到我的案头。当研讨会召开时，收入了孙郁、夏康达、王之望、张春生、耿传明、阎立飞等人论文的《梁斌新论》，就摆在了每一位与会专家的面前。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收获，是重新确认了《红旗谱》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著名文学史家张炯做了主题发言《感念梁斌》。他认为，“梁斌在小说艺术的创造上，有他独到的成就……他的笔墨跌宕多姿，人物性格通过自己的语言行动得到表现，很有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茅盾说：“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堪称是抓住了梁斌风格特色的评论。与此也可见，即使从“纯文学”的视角，《红旗谱》作为文学文本，它的艺术成就也不容否定……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迄今由止，在刻画中国现代农民的光辉形象上，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成功超过《红旗谱》的。”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正认为，“《红旗谱》是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一面不褪色的红旗，是一部经得起反复阅读和长久传播的文学经典。”

这次会议的批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较大变化，许多学者运用叙事学理论对《红旗谱》进行解读和分析，从文化、美学视角对《红旗谱》进行研究，扩展了梁斌研究视野，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思想和批评方法在梁斌研究中的一次集体实践。评论家金梅在《梁斌先生的文心》中写道：“在文学艺术上，越是地方的民族的，就越能走向世界。鲁迅先生的这一文学观念，现在不少人已不太相信了。梁斌先生却是一位在一生的创作中，对鲁迅的观念奉行不移的作家。他的《红旗谱》，能成为百年来小说经典作品之一，并引起外国文学界的重视，就因为它是这样的作品。”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科、南京师大文学院研究生王连英在合著的《魅力与超越：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的自然结合》中写道：“《红旗谱》具备了在那个时代一般作品很难达到的水准，即成功的民间叙事和鲜明的政治话语，特别是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的自然结合，宏大叙事和传统技法的结合，使其小说文本生发出经久难消的艺术魅力和喜人的超越。”

2009年10月25日，南开大学省身楼。由天津市文联、市作协、《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南开大学和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梁斌文学艺术论坛”进行了一整天，那热烈的气氛至今犹在眼前。为了做好论坛，研究会做了大量筹备工作，我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法清一起赴北京拜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陈建功是研究会的老朋友，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梁斌研究，我们举办的重要活动，不管多忙，他都会如期出席。他说，梁斌先生以不朽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崇高的文学地位，以高超的画作进入当代杰出画家的行列。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是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鉴于此，建功不仅热情邀请学者，联络主办单位，还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对论坛的祝贺带到会场，而前一晚他还远在千里之外，他连夜飞抵天津，凌晨入住宾馆，第二天一早，就精神抖擞地登上论坛。

22位评论家、学者发表了论文，梁斌文学艺术的现实意义成为关注的热点。评论家雷达以《〈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为题展开论述，他认为，《红旗谱》从生活的痛切感悟中对中国农民的深刻解读至今无人超越；主要人物朱老忠、朱老巩、朱老明、冯兰池、张嘉庆、运涛、春兰等等，确实曾是中国大地上的血色鲜活的灵魂，仍然充满艺术生命力；《红旗谱》对于民族化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方面的审美自觉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些构成了作品生命力的根源。他的观点得到在场学者的高度认同。筹备本次论坛时，我们在邀请函上将推动梁斌研究向多学科、多方法、多角度发展，开掘研究新领域，确定为论坛的主要任务之一。论坛闭幕后，我将论文汇编成书，收入吴义勤、王春林、崔志远、黄建生、刘卫东等学者的论文22篇，论文集取名《梁斌文学艺术论》，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从论文的研究成果看，其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心理学、版本学、翻译学、语音学、符号学等学术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也多种多样，有的论者将《红旗谱》放置于多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去分析，有的论者从影视改编角度考察《红旗谱》的艺术影响力。新观点、新概念、新方法，异彩纷呈；思想火花频闪，令人目不暇接。更可喜的是，学者队伍的年轻化倾向明显，梯队结构已经完备。老一代评论家老当益壮，仍然出精品出力作；“60后”、“70后”评论家挑起大梁；“80后”的硕士生也提交了论文，彰显着梁斌研究后继有人、后发有力。

对梁斌文学作品文本的研究还扩展到译本领域。田英宣在做天津市社科项目“《红旗谱》研究回顾与展望”课题的过程中，搜集到了《红旗谱》英、法、俄、日、西班牙、越南、朝鲜和哈萨克共8个语种的译本，发挥天津外国语大学多语种优势，组织不同院系、不同语种的老师，对各文本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撰写了论文《〈红旗谱〉的八种译本》，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这一成果，填补了梁斌研究中译本研究的空白。

研究会拓展了对作家本体的研究。《红旗谱》问世半个多世纪了，研究的文章汗牛充栋，但以往论家大多专注于文本分析，对这部巨著如何产生、即梁斌是如何创作出《红旗谱》的，研究不够。2004年，我撰写的著作《解读梁斌》出版，从梁斌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交汇点入手，着力开掘梁斌的精神世界。梁斌从少年起就受到革命文学的熏陶，是革命文学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正值革命处在低潮时期，13岁的他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革命生涯。他积极参与组织农民开展反割头税斗争。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张贴标语，飞行集会，誓死抗击日寇，为保定二师“七六”学潮奔走呼号。学潮失败之后，他流亡北京，参加左联，一面博览世界文学名著，一面以杂文为武器，继续坚持斗争。1937年5月，他返回故乡，参与组织第一支抗日游击队，武装保卫家乡。此后，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担任新世纪剧社社长和冀中游击大队政委，带领剧社，自编自导《爸爸做错了》《五谷丰登》《抗日人家》等多部话剧、歌剧，宣传群众，鼓舞群众，并培训农民文艺骨干，使1700多个乡村剧团活跃在抗日炮火中，这创造了世界戏剧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为了创作《红旗谱》，他不顾个人安危，潜入敌后采访抗日军民；为了“补上”土改那段生活体验，他放弃解放区安全的社会环境，毅然随军南下，率领工作组开辟新区；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他舍弃个人利益三次辞官不做，无欲无求，自甘寂寞，只事耕耘，不计收获，精益求精，死而后已。晚年，他将自己7部书的手稿全部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说：“我的文学是为人民的，我的手稿也是属于人民的。”《解读梁斌》是对作家本体进行的初步研究。2008年，由王洋、田英宣撰写的《梁斌传》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作家本体研究全面展开。

开展对梁斌先生书画作品的研究，是一项重大拓展。梁斌一生创作了大量书画，他的书画是文学的延续，与《红旗谱》系列长篇小说等文学作品，组成了完整的梁斌文学艺术成就，但50多年来，对他书画作品的研究，除了寥寥几篇文章外，几乎没有展开。2005年，研究会与天津市文联、天津日报社、北京炎黄艺术馆联合主办了梁斌书画艺术展，展出梁斌书画130多件，并召开了研讨会。来自京津的40余位书画艺术理论家、画家，第一次就梁斌书画艺术进行专题研讨，叶毓中、李松、水中天、王振德等专家，从不同理论视角，研究梁斌的艺术思想、艺术主张和艺术造诣，认为梁斌的书画与他的革命生涯息息相关。北方农村的瓜棚豆架，白洋淀的映日荷花，太行山的嶙峋山姿，武汉江边的清秀风光，都是他百画不厌、推陈出新的绘画题材。他画荷花荷叶，水墨淋漓，一花一叶见白洋淀浩淼云烟；他画枇杷葫芦，果实丰满，枝枝蔓蔓缠绕着乡土气息；他的焦墨山水更独树一帜，千里太行一派荡荡长风，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绘画语言和艺术风格。本次会议，标志着梁斌书画研究跨入了理论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我将会议论文编辑成《梁斌艺术论》，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书中还收入了2006年之前几乎全部有关梁斌书画的评介文字，以方便研究者参阅。李志强撰写的《生命之光》也于同年出版。2010年，《文艺报》发表了白金的文章《大气磅礴独树一帜》，提出“梁斌创立红色文人画”的论点，认为他“心怀天下，以人民忧乐为己任，所作每幅书画，几乎都承载他作为革命者的理想和寄托，有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清新追求，通过继承传统开拓新境，与技艺独造融为一体”。他的笔墨所获，大气磅礴，明快空阔，滋含丰富，简洁鲜活，特立独行，开创了一派画风。这是梁斌书画艺术研究的新成果。

为拓展梁斌作品和梁斌精神的社会传播，研究会三管齐下。其一，举办了“大地之子——梁斌文学艺术展”。展览从革命生涯、文学贡献、书画艺术、情系人民4个方面，生动地再现了梁斌波澜壮阔的一生，再现了一位文化大家丰厚的文化贡献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给展览发来了贺信：“革命生涯，文学贡献，书画成就，感人至深！值此巡回展在津展出之际，深深怀念终生根系人民的大地骄子——我们的文学前辈梁斌老师！”展览先后于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和湖北省襄阳展出，每到一处，都得到观众的喜爱。在石家庄，观众们用极大的热情欢迎梁斌“回故乡”，参展观众每天络绎不绝，他们中不仅有石家庄的参观者，还有从保定、唐山、京津等地赶来的观众；他们中不仅有伴随着《红旗谱》成长的中老年观众，更有年轻一代。很多观众参观后表示，梁斌文学艺术展是近年来文学艺术领域一次高水平的展览。梁斌的艺术思想、精神境界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展览，使人们了解了一位立体和真实的梁斌，不仅是一次文学艺术的盛宴，更带给观众一次心灵的震撼。志愿者成为展览的另一道风景。作为一项大型公益性活动，展览从策划、创意到设计、布展、新闻等各环节，都忙碌着许多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从在校大学生到耄耋老人，涵盖了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充分体现了广大群众对梁斌的深厚感情。河北师范大学、解放军炮兵学院、石家庄学院的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采访团活跃在展览开幕式现场，参与梁斌文学艺术展，这不仅是一次志愿服务，更是一次心灵净化，梁斌的人格力量感召着他们。展览期间，研究会还主办了讲坛，邀请专家分别就梁斌精神、梁斌文学、梁斌艺术进行了解读和讲座。

其二，以梁斌冠名举办全国征文。梁斌生前倾注极大热情，关心、培养、扶助文学新人，为文学人才的成长和文学队伍的壮大，默默奉献。他曾拿出自己的稿费，连续举办了两届梁斌杯“新苗奖”征文活动。梁斌去世后，研究会继承他的遗愿，继续面向全国青少年举办梁斌杯“新苗奖”征文，以“知荣明耻，修身立德，把握人生，拼搏奋进”为主题。稿件来自除港澳台以外的各省，应征者用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歌颂祖国，歌颂劳动者，抒发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表现出积极向上、勇敢进取的精神风貌。梁斌一生心系人民，尤其关心农民。研究会秉承梁斌精神，与《小说月报·原创版》和《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联合举办了扶植农村题材创作的“关注农民”梁斌文学奖。我们聘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副主席陈建功、评论家雷达、老作家杨润身担任评委。评奖从2005年—2008年共举办了两届，共发表中短篇小说60余部，20多部被刊物转载，13部中篇小说被改编为戏剧或卖出影视改编版权，孙春平、孙惠芬、夏天敏、秦岭、谈歌、陈应松等16位作家获奖。铁凝评委在审读了第二届入选作品后说：“第二届比起第一届，作家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加贴近现实，当下农村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当下农民命运和心灵的重大嬗变，都在应征作品中深刻地反映出来。比如土地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问题，比如城市化问题。同时，作品的文学性也很强。这就是梁斌文学奖的品格。”

其三，把红色经典引进大学校园。南开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有非常雄厚的文科基础，它的文学教育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享有盛名，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文学精英。南开校园里活跃着一批喜爱《红旗谱》的青年学生，他们迫切希望组织起来，阅读更多的梁斌著作，以梁斌为楷模，走梁斌的文学道路。2010年，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我们研究会的协助、指导下，学生自发组织了南开大学《红旗谱》青年读书会。读书会现有会员200余人，以传承和弘扬梁斌文学精神为宗旨，以学习研究、校园传播、社会实践为主要活动内容，建立了日常学习、研究立项、文化活动、社会实践、宣传总结5项社团制度，设办公室、学术部、宣传部、实践部开展活动，力争把读书会真正办成学习、研究、宣传、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青年先锋组织。南开大学的学生还自编自演了话剧《红旗谱》，以当代青年文化认同诠释红色经典。该剧受到同学们的热烈追捧，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大学生校园文化一等奖。许多院校发来邀请，校园版话剧《红旗谱》先后走进了中国戏剧学院、中国民航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中医大学、天津体育学院等院校，《红旗谱》青年读书会也在一些院校建立起来了。研究会成为传播红色经典的“促进会”。

10年间研究会经历了两次更名。2005年梁斌书画艺术研讨会之后，几十位美术评论家和画家加入研究会，会内艺术研究活跃起来，大家约定俗成，称研究会为“梁斌文学艺术研究会”。2012年，对梁斌精神的研究蓬勃开展，大家感觉仅以文学来涵盖梁斌已经远远不够了。经过理事会一致同意，顺利完成了注册手续，研究会正式更名为“天津梁斌研究会”。

《红旗谱》的经典价值 梁斌的人格魅力与

□牛殿庆

中国革命斗争的史诗式多卷本长篇巨制《红旗谱》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之日起不知影响了几代人，支撑当今社会栋梁的“50后”、“60后”，都是读着《红旗谱》长大的，它对那个时代人情风物典型的成功书写，为当今读者留下了难能可贵的时代影像，这便是《红旗谱》对文学史的贡献和经典价值所在。

梁斌已长眠在他的家乡元宝山庄，作为人民的作家他是不朽的。梁斌因《红旗谱》得名，也因《红旗谱》而受辱，但他面对人生的荣辱，保持了他宽容与豁达的人格魅力。我们从他创作《红旗谱》的经历中看到了他对文学的诚意和敬重，为创作《红旗谱》三辞官，他是抱定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决心而进行创作的。“文革”时梁斌与他的《红旗谱》亦在劫难逃，《红旗谱》被打成大毒草，说他走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反派批斗他，他不承认不低头。梁斌的人格有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刚烈、倔强，但他更懂得恕道，比如他原谅和保护了在“文革”中批斗他并把他从凳子上摔下去的年轻人。

梁斌还是廉政亲民的楷模。今天我们讨论《红旗谱》，不但把它当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书来读，更要学习梁斌这样的老革命干部老作家为人为官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这就是梁斌和这部经典巨制的现代意义。1985年梁斌离休按国家规定享受正部级待遇，可他却说“房子、车子、秘书我一概不要”。梁斌人格中有平等思想、亲民作风、仗义豪情以及爱国情操，这是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自律，这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他和他的作品所不容忽视的。比如说“文革”中他与送煤工、卖菜人的交往和感情，替住院欠费的老干部仗义直言的豪情。特别是他对手稿的处理，外国收藏家花10万美金收购他的手稿他都不肯卖，而将手稿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显示了其不为金钱所动的民族气节。陈建功说他是“堪称中国文学工作者的光辉典范”，一点都不为过。

他的人格中有执著勤奋的美德是值得我们今天做官、为人、为文效仿的，梁斌不仅是一个勤奋的文学家，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陈师曾说文人画的四要素是：“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性，第四思想。”梁斌的画是公认的画人画，他的文也具备这四要素。所以我们研究梁斌，不仅仅要研究他的文学经典，更要研究他以德养文以德为人的人格精神。

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有时代局限性，所以我们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到某些特殊时期的经典作家，不能用今天的文学标准和眼光把某一时期的作家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提出超出时代特质的文学要求，这不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态度。有位文学评论家撰文对《红旗谱》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完全否定，甚至用个人主观的好恶代替了文学批评，失去了文学批评家的理性和知性。这位文学评论家用亵渎的语言评判梁斌的《红旗谱》，我们从中并没有看到一个文学评论家应有的宽容和智慧。这位文学评论家称：“文革”时上中学初读《红旗谱》是“嚼蜡般的感觉”。2004年二读《红旗谱》读到三分之一，就下定义这“是极其拙劣的不堪卒读的”作品。“以梁斌的叙事才华，即使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也不可能写好的。”“《红旗谱》通篇都是由经不起推敲的情节组成”，“拙劣的细节则可谓俯拾即是”。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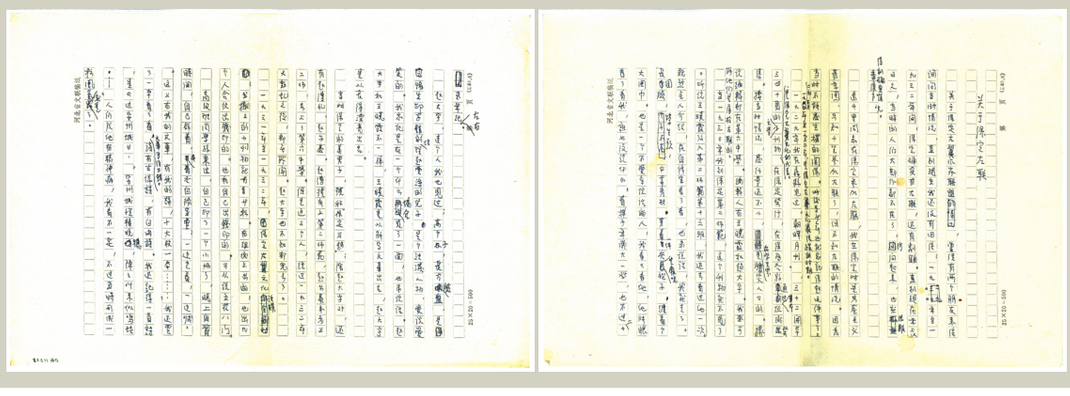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十七年文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作家和作品，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以今天的标准去对梁斌这样优秀的作家评头论足，说他的作品“还不具备什么能力，文学水平和文学修养欠缺，不可能写好故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习惯，其实我们读鲁迅的语言也能挑出一些毛病，尤其他的语言不尽符合今天的语法。地域语言也有区别，这里有个方言习俗的问题，我说这些并不是为梁斌作品中的一些问题开脱，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对待特定时代的典型作品的问题。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表现平凡的人物火热的生活。今天又有怎样的作品能印刷到600万册呢？应该说超过5万册的都是少有的现象。

《红旗谱》是那个时代史诗般的英雄主义经典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

有人说：“《红旗谱》是一个基本上不会写小说的人写的小说，是一个不具备起码的叙述能力的人讲的长篇故事。”据此他怀疑“洛阳纸贵”和“经典”的可靠性。虽然他在文中援引小说文本的分析论证不能不说有一些是经得住推敲的，但是完全否定就偏颇了，就不是客观的态度。文艺批评应该运用系统的文学理论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介入文学作品的内部，指出作品的历史担当责任，客观公正、中肯冷静地进行分析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对作者学问能力提出怀疑。说梁斌在当时“应算是知识分子”，说他“还不具备创作小说的基本能力”，这样的结论是不是缺少调查研究？分析论证是不是不太严密？真正的文学批评不能过多掺杂个人好恶。梁斌15岁就读于保定第二师范，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师范学校，属中专学历，梁斌在烽火硝烟中出生入死干革命，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完成这部120万字的恢弘巨制的，仅这一点就是令人极其敬重的。

梁斌记忆中的左联保定小组

□张元珂



关于保定左联情况手稿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至1936年4月解散。“左联”成立后，团结和组织自由派或中间派作家，积极培养青年作家，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向前发展。除了上海左联总部外，另外，在北京、武汉、广州、天津、保定及日本东京等地还存在着许多分支机构。它们与上海左联的关系虽然不是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呼应，既各自独立地开展左翼文化、文学运动，也在全国层面上形成协作关系。因此，左翼文学运动不仅仅是由在上海的左联开展起来的，也与全国各个小组（分盟）的努力密不可分。

目前，对于上海左联组织的研究，已经有相当充足的史料作为支撑，而对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研究，一直以来，就缺乏相关史料。其中，有关保定左联的文学运动情况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因此，任何一份文献资料，都显得弥足珍贵。如果相关文献资料不能被保存下来，当事人的口述、日记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我们在整理梁斌手稿资料时，发现一份珍贵的信件。在这封写给朋友的信件中，主要论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回忆1930年代保定左联开展文学运动的情况。（2）详细地展现了几个作家及文学活动家的生活细节和活动动态。（3）介绍保定左联的文学刊物情况，特别介绍了《朝晖月刊》的编辑、运营及传播情况。这都为学术界研究保定左联组织、左翼文学运动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鉴于这份史料的珍贵性，现在连同梁斌的手稿一同刊出，以供有志于研究左联，特别是其分支机构的学者参考。

关于保定左联

关于保定左翼作家联盟，曾经有两个朋友来信询问当时情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回信，1930年至1932年间，保定确实有左联，还有剧联。直到现在年长日久，当时的人们大部分都不在了。访问起来，也就很难得到确实情况。

远千里同志在保定参加左联，我在保定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只知千里参加左联了，但不知左联的情况。因为当时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此后多少年也就忘记谈起这件事了。1929年至1933年间是保定左翼文化最活跃的时期。1929年我在蠡县见过《朝晖月刊》，32开本，三四十页的文学刊物，是保定左翼文化的代表，在保定发行，在保定各县通过组织发售。按当时情况，发行量还不小，在学生界是脍炙人口的。据说编辑部在第六中学。编辑人有王晓霞和赵大宇。我想他们可能属于左联的。

当1930年我到保定第二师范，这个刊物就不见了。听说王晓霞考入第二师范第十三班，我还去看过他一次。既然无人介绍，在自修室看了看，也未说话，我就走了。长圆脸，学生头，中等身材，穿着一件蓝麻呢袍子，缠着个大围巾。也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我看了看他，他张眼看了看我，谁也没说什么。看样子年岁大一些，也不过20岁年纪左右。

赵大宇，这个人我也见过，高个子，长方脸，是园协生印字馆的经理赵云诗的儿子，是个活泼人物，爱说爱笑的。我忘记是在一个什么场合见过一面，也未说话。赵大宇和王晓霞不一样，王晓霞是以能写文章出名，赵大宇是以长得漂亮出名。

当时保定的美男子，号称“保定三赵”，除赵大宇外，还有赵传礼，赵尔泰。赵传礼考上第二师范，赵尔泰未考上二师，考上了第六中学。但是，这三个人经过了1932年大暴乱之后，都无所闻。赵大宇也不知哪儿去了。

1931年至1932年，保定左翼文化活跃。书摊上的刊物就有多少种，有组织上出的，有几个人合伙出钱印的。也有自己出钱自己印的，可以说五花八门。

高级班同学孙秉位，自己印了一个小册子，晚上自习时间，自己拿着，串各自修室卖，一边走着，一边喊：“这上有我的文章，有我的诗，10大枚一本……”我还买了一本看了看，文章写得不错。诗有古体诗，有自由诗。我还记得一首诗是《过安州城》，“安州城里栖晚鸦，阵阵叫来似鸣蛙……”人们说他有精神病，我看不一定，不过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就是了。